

约谈问责不能“高举轻落”

张 毅



科学、高效、公平地利用土地,不仅事关可持续发展,更关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在酝酿系统改革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征收条件和征收程序等制度机制的过程中,强力遏制违法违规用地势在必行

“东部曾经出现的土地管理矛盾,正在西部集中显现。”这是前不久国家土地督察西安局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一番感言。此话的背景则是该局上半年的一次针对西北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审核督察行动。据报道,在西安13个区县、7个开发区共计20个督察对象中,11个区县政府和开发区的负责人因违法违规用地被集体约谈,占比55%。

其实,上述现象绝非西安独有,令土地督察焦虑的也不仅是违地规模,而是难以约束、遏制的违法用地趋势。两年前的执法检查就已经警示“西部违地大幅增

决算公开 还需评价支出绩效

李长瑞

日前,中央部门财务决算陆续公开,对“三公”开支预算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增长作出了说明,并将公务用车经费细化公开为购置费和运行费。此事在社会上引起热议。

应该说,今年的中央部门决算公开,是在前两年公开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并且此前还公开了财政审计报告,把决算公开向前推进了一步。从公开的数据来看,超9成的中央部门“三公”花钱减少,体现出各部门主动压缩“三公”支出的努力,释放出向建立廉洁政府迈进的积极信号。

在解读时,人们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三公”经费支出的变化情况上,看到数字压缩或减少,认为节支已见成效。“三公”经费得以压缩,自然是一种好现象。不过,公开的只是几个大数字,一般人很难看明白数字背后的真实情况,以致有人说“就决算公开的内容而言,是外行看不懂,内行也看不清楚”。这正是“三公”公开工作中所需要解决的。

而且从中央部门决算总额看,一些超出预算的花费是否有正当原因,需要深化细化说明,以便判断超预算花的钱是否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应该开展支出绩效评价,进而把绩效评价结果再公开,这样就可使“三公”经费公开更清楚一些,才能促使国家机关更高效地用好财政资金,进而使人们的疑虑和质疑更少一些。

可见,“三公”经费的公开既是推进预决算公开的突破口,也是加快整个政府信息公开的抓手。数字的公开仅是工作的一个方面,今后如对中央部门的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并将其纳入公开的内容,效果或许会更好。

让文明成为通行证

房清江

时值暑期,已开放1个多月的广州图书馆新馆,以优越的环境和丰富的藏书吸引了大批读者。同时,一些孩子追逐嬉闹已影响到读者的正常阅读。

从表面上看,这些孩子追逐嬉闹且不听劝阻,是孩子活泼好动的天性使然,可理解为孩子的自控能力差。但孩子们的表现是一面镜子,照出的还有家长责任的缺失。比如,面对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提示,部分随行的家长不但不予配合,还很生气地批评工作人员,有些家长甚至聚集在大厅里大声说笑。家长成了“坏榜样”,孩子的放纵嬉闹便显得似乎顺理成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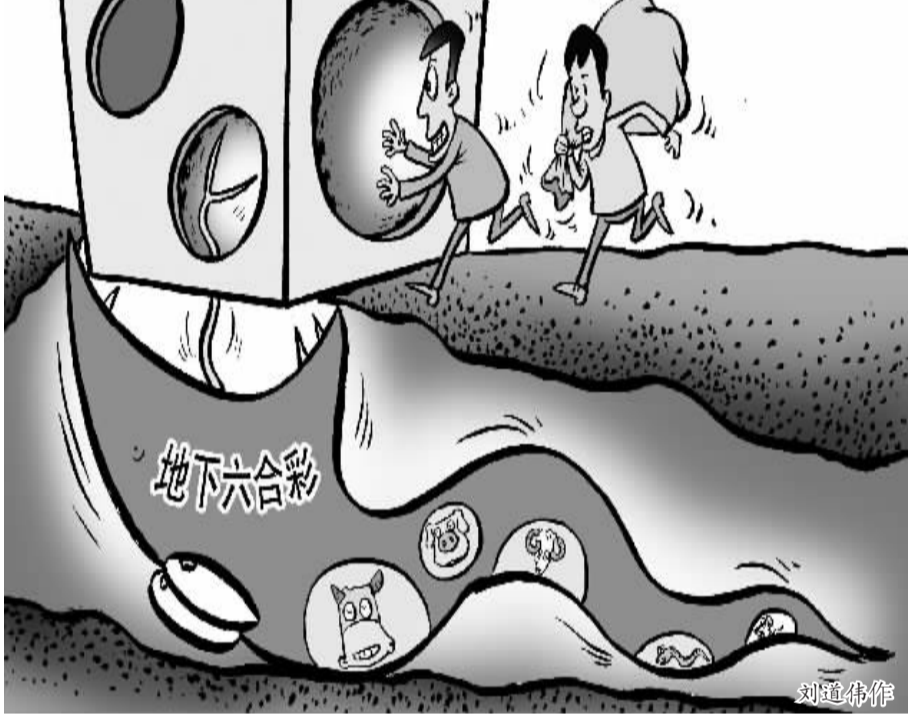
图书馆是公共场所,知识与阅读决定了保持安静的必要性,不得大声喧哗与追逐嬉闹是对他人权利的基本尊重。从某种意义上讲,到图书馆阅读是公民基本文明素质的一个缩影。人们到图书馆阅读,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还应该在精神与素质的塑造、提升方面有所追求。必须让文明成为图书馆的通行证,使人的素质与表现与图书馆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匹配。

一方面,图书馆应加强对读者的教育和引导,让所有读者,哪怕是孩子都懂得在图书馆阅读必须遵循应有的准则,做一个有品位的读者,成为文明素质的重要社会课堂。另一方面,孩子在图书馆的行为表现,应当成为衡量家庭教育水平的一把标尺,从中看到自身文明素质的缺失和行为无意识对孩子的影响,增强自身公共文明素养的自觉性,培养教育孩子公共文明道德的意识与自觉。此外,图书馆的文明准则,如同治理“到此一游”陋习一样,都应纳入公民文明素质的具体行为公约,在全社会加强宣传和教育,逐步形成全民共识,变成自觉遵从的规则,从而内化成素质的一部分。

开。有以上两种现象“托底”,便不难理解违地行为何以“前仆后继”了。

人多、地少、发展快,这是当下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土地资源利用面临的约束性课题。如何科学、高效、公平地利用土地,不仅事关可持续发展,更关乎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三化”与土地要素息息相关。因此,在酝酿系统改革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征收条件和征收程序等制度机制的过程中,强力遏制违法违规用地势在必行。其中,行政约束之外,借鉴国际经验,科学运用法律手段当是根本之道。如果违地行为入罪,“以身试法者”、“纵容袒护者”、暗打“迎风板”者甚至徇私枉法者必然寥寥。纵然有也不怕,毕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法理凿凿公而不私。18亿亩耕地是一条“红线”,既然目前靠人的理性自觉、靠行政约束都难以守住,那么,就让法治来守卫吧。

无底洞



刘道伟作

近年来,地下六合彩从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蔓延,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也出现了六合彩重灾区,地方经济金融秩序遭受重创。据报道,今年3月份,湖北某县一位基层干部,从同乡那里骗来数百万元血汗钱全部用来买六合彩,结果输得精光。

“蓝天白云”离不开制度保障

翟 峰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近日举办。论坛之所以广受关注,与近年来大范围雾霾天气等污染突出事件和问题有关。

笔者是一位长期从事环境保护立法和执法监督工作的省市两级人大代表,对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各种环境治理问题一直很关注。根据多年的调研和思考,笔者认为空气污染治理要取得切实成效,有必要建立跨区域大气生态环境监管制度,并完善相关的奖惩制度。

在建立监管制度方面,可以设立相应的区域性大气污染管理部门,使其在工作目标、监测、行动等方面达到区域性统一,尽快实现并完善跨界大气环境的监管立法。如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可在国家制定相关标准的基础上,先行制定具有大气污染控制法律标准的地方区域性法规,区域内的跨界纠纷也可共同协商解决。对于达标和未达标区域,可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理策略,特别是对未达标地区应特别制定具体的严控标准,以促使其空气质量达标并不危及其区域内的其他地方。

在建立奖惩制度方面,有必要按照下大力气解决好现有体制下综合性区域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的要求,学习一些地方行之有效的跨界断面水质超标扣缴制度,将其经验引入跨区域大气生态环境监管治理之中。只有奖励补偿和惩处规则分明,才能充分调动区域内跨界环境污染治理的内生动力,树立跨区域环境污染的全域治理有责和全民跨界治理的意识,共建“蓝天白云”的洁净天空。

去年的北京“7·21”特大暴雨,给城市应急管理上了严肃的一课。然而,时隔一年,因为大雨而发生内涝的城市依然近20个,多地频现市民街头捉鱼、“城中观海”的奇景。可见,城市内涝所带来的尴尬或痛楚,远未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

【微评】雨季来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一句话:要检验一个城市是否真正现代化,一场大雨就足够。一场大雨使一些城市成了高风险区域,这十分值得人们去深思城市建设如何与人、与自然更协调。从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排水等城市管道建设应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这就要求城市管理者改变“重地上轻地下”的发展观念,更加注重城市的“里子”,统筹做好城市建设工作。不再让城市因暴雨而尴尬,不再让生命因暴雨而脆弱。

冰块细菌超标令人心寒

近日,有媒体在北京崇文门肯德基、真功夫和麦当劳3家大型快餐店,取回可食用冰块进行抽样检测。检测结果发现,肯德基崇文门店、真功夫崇文门店的冰块菌落数量高于国家标准,且高于马桶水箱水样品的5倍至12倍。

【微评】地处繁华商圈,均为知名品牌,肯德基、真功夫等店铺冰块菌落数超标,甚至不如马桶水的冰冷现实,折射出某些快餐行业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快餐行业客源的巨大流动、食品的快速消耗、特殊的消费形式,让快餐食品安全监管难度加大。但越是难度大,越应加强监管,堵住漏洞。对政府部门而言,要建立食品质量抽查长效机制和部分店面安全情况公布机制,以对食品经营者形成有效约束。对相关企业而言,要真正将食品安全摆在首要位置,不要拿自己的品牌和影响力去试探消费者忍耐的底线。快餐虽然求“快”,安全可不能打了折扣。

最严玩具标准也是机遇

近日,《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正式实施。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被认为在物理、化学、电子、卫生、辐射等诸多领域里作出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规定”。而欧盟市场上80%以上的玩具是从中国进口的。

【微评】号称“史上最严”玩具标准的出台,必将对我国玩具产业形成较大冲击,特别是将大幅提高玩具生产成本,影响产品竞争力。不过,这对“中国制造”玩具而言,未尝不是一个摘掉“低质低价”帽子的有利时机。为了节约成本,制造商不妨向上游的产品设计、品牌、原材料供应和下游的销售渠道延伸,这无疑能够增强企业的整体抗风险能力。为了提升质量,制造商将积极研发新产品,打造特色产品,培育自主品牌的产品。倒逼之下,“中国制造”玩具或可闯出一片新天地。

(更多内容请浏览经济日报腾讯法人微博 <http://e.t.qq.com/jingjiribao>)

欢迎读者就热点经济话题发表评论、漫画,来稿请发至:mzjjgc@163.com。
本版编辑 马洪超 杨开新

城镇化不妨从改农民工身份做起

瞿长福



庞大的农民工人群是现在最有条件、最适合真正城镇化的人口。从“人的城镇化”的要求出发,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最大实际出发,应该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和步骤

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在积极推进。有人提出,为了保证城镇化速度,全国每年要把至少1000万农民转移进城。一些地方也为此采取措施圈地划城,规划打造容纳动辄几十万人口的新城区。

城镇化发展需要一定速度,需要与这种速度相配套的措施手段。但城镇化速度的依据是什么,为此要制定哪些配套政策措施,需要科学合理地进行考量界定,否则就容易走上土地城镇化、指标城镇化、规模城镇化老路。

按照统计,我国的城镇化从1996年开始提速,当年的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04%提高到30.48%,增长1.44个百分点。此后大体以这一速度发展,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2.6%。或许根据这种数字指标上的城镇化速度,我国每年可以转移上千万农民进城,再过多少年,就可以达到60%以上的城镇化率。

不过,这种数字上的城镇化率还需要从很多方面加以夯实。据统计,在现有的城镇化率中,真正拥有城镇户籍的不超过36%,另

外的“城镇化人口”并没有城镇户籍。也就是说,即使单纯从户籍指标上来考量,这样的城镇化率也还有许多水分,何况城镇化中应平等享有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方面的保障还没有全面均等覆盖。

可见,按什么样的发展速度,不能只从数字指标上入手,而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根据城镇化一定阶段的合理承载能力,从“人的城镇化”的要求出发,从我国现阶段发展的最大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速度和步骤。

这里的最大实际是什么?根据最新统计,我国现有2.6亿多农民工,其中近1亿人在本地打工,1.6亿多人外出务工。其中,有相当多的人已经在城镇安家,他们不可能回到土地上;有相当一部分虽然没有在城镇定居,但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根本不打算回到农村;还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灵活性,最终选择城镇或乡村完全取决于“城里好还是乡下好”。也就是说,这一巨大的人群是现在最有条件、最

适合真正城镇化的人口。

另一方面,现在居住在农村的人口除了部分“留守儿童”和部分终将随子女进城的老人,其他基本属于不能走、不愿走、暂时没有条件走的农民,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既是现在的务农主力,也是将来的乡村“守望者”,他们与土地的关系是唇齿相依,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子”。

在现实中,一些地方的城镇化眼光恰恰忽视了人在城镇的农民工,不是创造各种条件让他们真正“市民化”,真正享受城镇化给生产生活带来的各种便利和好处,而是将眼光盯在了农村,盯在了现在还不具备城镇化条件的农民身上,盯在了农民的土地上,总是想方设法圈地盖楼,圈地建城,强迫农民离开土地,强行让农民买楼进城。这样的结果,实际上与城镇化的要求和目标背道而驰。

因此,从实际出发,从有质量的城镇化出发,从人的城镇化出发,还是先从农民工的真正城镇化做起。